

改革25年来，  
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化  
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化，  
而巨大的流动人口和  
城市农民工是  
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  
核心内容。

2



世纪群学文库

*Urban Migrant  
Worker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 李强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农民工 与中国 社会分层

# 农民工与中国 社会分层

○ 李强 著

*Urban Migrant Worker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

· 世纪群学文库 ·

---

著 者 / 李 强

---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dph.com.cn>  
责任部门 / 教材与外语图书事业部  
(010)65281150  
责任编辑 / 李建红  
责任校对 / 泓 润  
责任印制 / 同 非

---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客户服务中心  
(010)65285539  
法律顾问 /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 艺苑印刷厂

---

开 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3.25  
字 数 / 320 千字  
版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 7 - 80190 - 350 - 1 / C · 005  
定 价 / 28.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本书书名所列的两大主题“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是笔者很长一段时间所关注的主要研究领域。笔者对于社会分层的研究始于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人民大学还没有社会学这个专业，笔者对于社会学的兴趣更多是读书得来的。当时，有关社会学的著作中文版很少，多数是外文书。在北京，外文书藏书最多的要数“北京图书馆”（今天已易名为“国家图书馆”）了。读研究生的时候，着实读了不少北京图书馆的外文书。那时候的北图还没有搬到现在的白石桥，还是在北海南门的老北图。笔者有幸能够得到北图的外文外借的图书证，数不清有多少次来来往往于当时所居住的北城地兴居和老北图之间，借阅了大量书籍，其中很多是社会学的著作。所以，后来写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写的是有关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探讨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也可以称作中产阶级，当时国内的术语还是“脑力劳动者”。

笔者对于城市农民工研究的兴趣也是说来话长，1990~1991年在英国布里斯特尔（Bristol）大学访问一年，是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的，读书过程中，看到大量关于迁移（migration）方面的材料，1992年夏季在美国安阿伯（Ann Arbor）密执安大学安静的图书馆里也阅读了不少城市移民（urban migration）方面的书籍。这样从90年代初期开始，先是从理论上，后来又从实证上

探讨流动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农民工问题。本书是作者在大约十多年的时间里，关于城市农民工、城市流动人口、中国城市化问题等主题研究心得的一本集子。

笔者在本书中提出了和试图验证如下的一些观点：

第一，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中国城市农民工是城市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里较长期地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无论他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城市的，而是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农村的社会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处在城市里的边缘位置上，所以常被称为城市中的“边缘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成为城市里的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与农民也有根本的区别，他们受到城市文化的熏陶，接受了城市的不少文化和观念，这些使得他们很难再复原到农村原来的生活轨道上。

第二，造成上述城市农民工特殊社会分层地位的首要制度原因在于户籍制度。本书探讨了新中国户籍制度的起源，认为，户籍制度建立以后，起到了两个最主要的社会功能，第一是使得革命以后的经济分配、资源分享的秩序得以维持。我国在尝试了打碎阶级的实验以后，需要用“非所有权”的屏蔽手段来维持经济秩序，而户籍是“非所有权”式的、最为有效的屏蔽手段。依靠户籍阻止农民进城，实现了向城市工业发展倾斜的政策，完成了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笔者认为，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一种身份制度，当然，构成当时中国身份制度的不仅是户籍，除了户籍制度外也还有一整套复杂而又相互匹配的身份制度，但是，户籍制度是这套制度的核心。笔者认为，改革以来，户籍制度的“社会屏蔽”功能有所衰落，经济所有权的功能已经出现了回归的趋势。财产权作为社会筛选机制和技术证书权的筛选机制都已经对于户籍权力提出了挑战。当然，在产权方面和技术证书方面，农民工

也不占优势，农民工仍然有可能处于城市社会分层的下层。但是，产权和技术证书权作为主导的社会筛选机制以后，社会公平的机制和理念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三，在上述户籍制度的影响下，传统的人口流动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发生了变化。中国农民工流动的推力与拉力的模型与国际上的模型有很大区别。在户籍制度的作用下，推力与拉力都会出现变形。有些推力或拉力，会出现“功能失效”，也就是说，此种因素虽然还存在，但是它却失去效用，从而使流动人口不再遵循一般的推拉规律。迄今为止，我国的户籍改革虽然也推出了若干重要举措，但是，原有制度的惯性较强，户籍使推拉失效的现象依然如故。

第四，笔者提出，非正规就业会是数以亿计的流入中国城市的农民工就业的主要形式。应充分认识非正规就业的正向社会功能。非正规就业为中国巨大的失业人口、流动人口、过剩的农村劳动力留下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应改变目前对于非正规就业的管理对策，改变一些地方打击非正规就业的作法，应对其采取扶持、帮助的对策。从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也是协调社会各个阶层利益的必要机制。从根本上说，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都应当得到保障，而不应该仅仅是城市居民和正规就业者的利益得到保障。

第五，农民工中有底层精英存在，如果对于他们通通采取整体排斥的政策，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

第六，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是职业流动最为频繁的群体，然而，频繁的职业流动并不能导致他们职业地位的上升，笔者提出地位累积的解释，城里人由于可以通过档案制度实现地位累积，而农民工则没有地位累积。

第七，笔者将我国城市农民工的家庭关系归为五种基本模

式，即单身子女外出型、兄弟姐妹外出型、夫妻分居型、夫妻子女分居型和全家外出型。笔者发现这些以分居为主要特征的家庭模式，与传统的家庭理论是冲突的，也给社会学研究带来了很大困难，笔者对此进行了阐释。

第八，笔者印证了中国城市农民工高比例向家乡汇款的现象，笔者分析了这种向家乡的高比例汇款的原因及其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第九，笔者发现，城市农民工的多数处于无保障状态，受到失业、疾病的频频袭击，笔者提出了建立三条保障线的对策建议。

第十，笔者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城市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发现了流入城市农民对城市居民的不满情绪。本书剖析了我国农民与市民交往的历史，提出在今后几十年里，流入城市农民与城市居民将是在我国城市中共同生活的、长期共存的两大社会群体，提出增强他们之间的沟通、理解与合作，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误解与冲突，从而保证我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

第十一，本书从剥夺理论视角研究了中国城市农民工在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等方面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提出绝对剥夺在现阶段还是普遍现象，提出了多阶剥夺的观点，认为绝对剥夺降低以后，相对剥夺的问题还会再提出来。

第十二，本书证明，城市外来人口分为两个大的群体，他们的构成和需求有巨大差别，因此在户籍改革上，要分析户籍为不同群体带来什么样的实际利益，特别是要理解两大群体的不同要求，根据他们的要求进行改革。

第十三，本书分析了中国城市化的五种模式，即小城镇模式、中等城市模式、大城市模式、城市群模式和乡村生活城市

化模式，认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道路显然不应固守在某一种模式上，而应采用兼收并蓄的方针，根据不同情况采用多种模式。

第十四，本书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人口高度密集的东南沿海城市带的形成是难以避免的。“东南沿海线”是与传统“爱辉-腾冲线”大体平行的划分东南沿海省份与其他地区的线条，该线东南是我国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东南沿海是我国农村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可以预计是未来中国人口最为集中的聚集区，也将是中国城市化未来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

第十五，本书提出了三元社会结构的思路。三元结构首先是以二元结构为历史前提的，笔者认为使用三元社会结构的说法更能够反映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三元群体的本质在于它与农村居民相比是一个占有有一定城市资源的群体，它与城市居民相比又是一个仅占有十分有限城市资源的群体，是被排斥在正式的城市居民之外的非正式城市群体。这个新产生的群体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而可以说是一个新的身份群体。

本书除了笔者的劳动以外，也凝聚着笔者过去和现在的一些学生、朋友的贡献。本书第十四章是由笔者当时的学生、现在中央编译局的周红云博士完成的，第二章、第十五章和第十八章，则是笔者与研究生张海辉合作的成果，第十七章第一、二节的写作则有笔者过去的学生，现在人民大学任教的李迎生教授、郝大海博士的参与。清华大学的唐壮先生为第六章做了不少文献准备工作。此外，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大多是笔者组织学生进行调研完成的。对于所有上述学生、朋友、同人的贡献，在此深表谢意。

笔者多年来的研究和写作是在妻子张华女士无微不至的关心

下完成的，所以，也特别感谢她的贡献。

本研究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1ASH003）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02JAZ840003）的资助，在此谨致谢忱。

李 强

2004年7月5日于清华大学蓝旗营小区

第一章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概述 .....	1
第二章	我国城市外来人口之现状 .....	16
第三章	户籍分层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 .....	28
第四章	影响我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 因素分析 .....	41
第五章	劳动力市场与城市农民工的就业 .....	74
第六章	城市农民工与城市中的非正规就业 .....	97
第七章	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底层精英 .....	123
第八章	农民工的初次与再次职业流动 .....	143
第九章	农民工的家庭模式 .....	161
第十章	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 .....	180
第十一章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	206
第十二章	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 .....	217
第十三章	城市农民工的被剥夺问题 .....	240
第十四章	农民工的两种分化模式 .....	274

第十五章	城市外来人口两大社会群体的差别及其 管理对策 .....	293
第十六章	我国城市化和流动人口的几个理论问题 .....	306
第十七章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	324
第十八章	我国城市布局与人口高密度社会 .....	349
第十九章	三元社会结构与城市农民工 .....	368
第二十章	关于流入城市农民研究的一些理论 .....	392

# 第一章 农民工与中国社会 分层概述

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城市农民工。为更准确地给城市农民工定位，有时候就会涉及更多的相关群体，比如城市流动人口、城市外来人口。目前从数量上看，中国的城市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城市流动人口、城市外来人口的最主要构成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城市流动人口、城市外来人口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其他城市来的白领群体，甚至还有其他国家来的人群。所以，本研究也会涉及除农民工以外的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城市外来人口是相对于本地市民而言的，作为比较，也不排除外来人口与本地市民关系的研究。

本书主要是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分析农民工群体的，即剖析这个群体在当今中国的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生活或生存方式、社会特征及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等。城市农民工是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对于农村人口大规模地流入城市的现象，社会学称作“城市化”和“工业化”。所以，虽然本书的主要观察角度是社会分层，但是，也不排除从相关的“城市化”、“工业化”，甚至“城市规划”、“城市布局”角度观察城市农民工现象。

让我们还是先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谈起吧。

## 一 关于社会分层

开宗明义，先要澄清概念。“社会分层”（social stratification）这个词，对于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个生疏的概念。如果从字面上推测，大约可以理解，是指社会分成层次的现象。确实，在社会学上，这个词最初是从地质学中引入的，是用地质中的分层现象比喻人类社会社会中社会群体之间的层化现象。

100多年来，社会分层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学研究的最重要领域之一。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分层、地位差异现象涉及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十分引人关注，在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时期尤其如此。另一方面，社会分层研究也是剖析社会的重要手段。试想，若要进行社会研究，面对芸芸众生，比如像中国这样将近13亿的人口，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进行研究呢？显而易见，最简便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人群进行分类。分类有多种方法，比如，分成男性、女性，分成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根据人们垂直地位的差别进行分类。比如根据人们财产或收入的差别分成不同经济地位的群体——穷人与富人；再如根据人们职位的高低分成管理者、被管理者等等。因为，从此种分层地位的差别更容易解释人们的社会关系与社会行为。本书就是将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上的一个社会群体——城市农民工，拿出来做专门的研究。

如果非要给社会分层下一个定义的话，那么，可以说，社会分层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由此可见，社会分层讨论的是比较敏感的问题，社会分层在本质上探讨的是平等不平等、公平不公平、公正不公正的问

题。所以，本书的主旨是研究如何公平、公正、平等地对待城市农民工。

社会分层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十分讲究等级层次的社会：孔夫子讲“礼”，强调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等级的分层次序；连落草的水泊梁山的兄弟们，也要隆重地排一排座次。迄今为止，无论是出席礼仪、会议发言、电视镜头、报纸上人名之先后等等，都常常遵循严格的级别顺序。

然而，农民工在社会分层的体系上被放在了什么位置上呢？显然，在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结构中，被放在了边缘的位置上。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这样一种不平等结构，究竟公平不公平呢？

从本质上说，既然是分层，那么，处在不同层级上的人群之地位就是有差异的，所以，不平等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人们之间的地位差异是否可以消除，因为，如果地位的差异可以消除，那么，不平等的问题就有可能解决了。第二，如果不能消除，那么，什么样的地位差异是公平的、公正的或合理的呢？对于第一个问题比较好回答，因为，我们考察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还没有发现哪一个社会能够将人们的地位完全拉平；就是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据称所谓“母系社会”、“父系社会”，至少性别差异造成的地位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差异并不是坏事情，水如果没有“落差”都不会流动。既然不能消除差异，那么，什么样的地位差异是公平的呢？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地位有差异，同时人们的能力、贡献也有差异，那么，让最有才能、贡献最大者去承担最重要的职位就是公平的。换言之，让最适当的人处在最适当的地位上是公平的。这种观点就是“功能主义”的社会地位观。最早表述这一思想的是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Durkheim）。他认为，在

任何社会中总有某些工作被视为比其他工作更重要，而社会上人们的才能、知识、智力、技术水平也各不相同，因此，让最有才能者去担负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公平的，否则就是不公平的。这种观点与邓小平同志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有相通之处的，即让有才能、贡献大的人处在经济收入的较高位置上。

如果是按照这种思路的话，那么，关于农民工处在边缘地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就要看农民工的才能、水平、贡献究竟是高还是低、是大还是小的问题。实际上，人们普遍承认，近20年来，农民工在城市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处在边缘的地位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不公平、不公正的问题才成为本书探讨的一个主题。

## 二 农民工在中国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位置

社会学自韦伯（Max Weber）以来比较强调从三个向度测量人们的社会地位，这就是：第一，财富地位或经济地位；第二，权力地位或政治地位；第三，社会声望地位。要说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似乎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要测量农民工的这三种地位，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分层体系。为什么说它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分层体系呢？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里，分层体系是一元的，即全社会是一个统一的阶级体系。比如，研究阶级结构的新马克思主义大家赖特（Erik Olin Wright）认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阶级结构都是类似的，分为三个基本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劳工阶级，以及三个矛盾状态的阶级——经理与监督阶级、小雇主阶级、半自主受雇者。他用这个结构解释了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现象。又如，社会学家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将英国的社会

阶级分为公务人员阶级、非体力办事员阶级、小资产阶级、农场主阶级、技术工人阶级、非技术工人阶级和农业工人阶级等七个阶级。也就是说，上述这些阶级在同一个国家里，是一个统一的有特定相互关系的体系。中国情况的复杂性在于，城市和农村各自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体系。两个体系之间，并不容易换算。比如，一个农民在农村经营很成功，建立了一个村里或乡里的企业，雇了百八十人，当了老板。如果一个社会有统一的阶级体系的话，他显然属于资产阶级了，属于财产分层的社会上层阶级了。但是，他到了城市里，人们称他为“农民企业家”，还是脱不了农民的帽子。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如果是在1979年的改革以前，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交往不多，所以两个体系也无所谓，也不需要换算、定位。然而，今天超过一亿的农村农民工来到城市里，自然就遇到了他们在城市里的社会地位问题。

由于农村的整体劣势，在与城市各阶级相比较时，农村中的各个阶级，就都被各种社会制度、社会习惯放到了较低的位置上。这一点从通婚上也可以明显看到，一个农村女孩子到城市里来，如果她嫁给一个城里人，似乎就是高攀了。近来，很多小说、影视作品都有这样的情节：农村中条件很不错的女孩子嫁给了城市里条件很差的男性。所以，假设城市里的分层是一部阶梯，农村的分层是另一部阶梯，当两部阶梯放在一起的时候，农村的阶梯自然就被放到了比城市的阶梯低很多的位置上。正因为如此，当农民工来到城市的时候，先天地就处在了城市的边缘地位。在居住区位上，他们大多居住于城市的周边区域或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的生活条件很差，但房租便宜。他们的消费低于城市一般居民的消费水平，形成了一套适合自己消费水平的服务和商业体系，比如非正规的小货店、小饭馆、小诊所、小洗浴等。

竞争力很强的农民工之所以处在城市的边缘位置上，首先是受到了制度的排斥。在过去，当《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

法》还生效的时候，一个忘记带证件的农民工走在大街上，就有可能被收容、遣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收容的农民工没有对此提出疑问，全社会也没有提出质疑。直到2003年1月15日中央《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中提出不许歧视进城农民以前，全国很多城市的劳动部门都有关于限制农民务工工种的规定。如果仔细追究起来的话，这种规定是违反宪法的，因为，宪法赋予了每一个公民平等的劳动权利。近来，随着中央对于农民工权益的重视，制度法规方面对于农民工的歧视正在逐步得到纠正。但是，长久以来城乡居民形成的观念、习惯，还是很难改变的，所以，农民工至今还是处在城市阶级体系的边缘位置上。

在经济方面，城市里有两种截然分开的工资、报酬体系：一种是对有身份的人、对城市市民提供的，另一种则是提供给外来民工的。本书第七章分析城市里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提供给外来民工的报酬，不仅数量上比市民要低很多，而且福利保障上也不承担责任。根据笔者的调查，不仅一般的建筑部门、企业部门按照较低的报酬体系标准付给农民工工资，就连政府部门、党群机关、号称象牙塔的大学、社会公益部门，这些作为社会形象、社会代表的机构，也是一样，不仅付给的工资低，而且多数情况下都违反劳动法的规定，不给所雇佣的农民工提供医疗、就业、养老等保险。所以，依据韦伯所说的经济地位标准，农民工也依然是处在底层的位置上。好在中国是城乡二元分层体系，对于很多成功的农民工来说，虽然他们在城市里被视为底层，但是，回到家乡，他们却可以“衣锦还乡”，很多农民工在家乡有“小洋楼”，生活是比较富裕的。在社会调查中，笔者也确实遇到过一些农民工，他们告诉笔者，别看他们在城市里衣衫褴褛，他们在家乡、在村子里却属于富裕户，还是很有身份的。